

先用甘寒养胃之品，挽救已耗伤的津液。然后再给其服药一小碗。颖甫服后顿感浑身湿润，半夜衣被俱湿，换掉湿濡的衣服后，全身始感舒坦，再进二碗米粥，遂安眠达旦。3日后竟能下场应试了。再与姻丈见面时，询及用药，才知是《伤寒论》中的桂枝白虎汤化裁，药仅桂枝、石膏二味。由此，曹颖甫更加信奉经方的神验。

曹颖甫对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可谓奉之经典，时时研读，未敢或放。在他历游山左、湖湘之时，行囊中亦恒以仲景方书相随，未尝一日忘废。归家后，研读医经之余，又常与里中乡医或儒者相互讨论，以阐发经旨。但曹氏对汉以后诸家，尤其是金元刘张李朱等抱有偏见，认为他们的学说只是偏于一隅，卑不足道。故而受到里间众时医的非议，和者盖寡。曹颖甫的临床特点是诊疗疾病时恒以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为依据，处方用药都依照仲景的法则规律，甚至药味份量丝毫不改。他善用麻黄、桂枝等辛温解表药，而对桑叶、菊花等则绝不使用。临证中，他往往峻剂猛药而获显效，故也有“曹一帖”的称誉。

近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医学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，各种思潮风起云涌，学术争论十分活跃，各个医家流派对曹颖甫所代表的经方派也褒贬不一。很多人认为他过于守旧，背时好古；而赞成的则说他是仲景学说的忠实追随者，经方派的典型。曹颖甫自己对他人的议论并不放在心上，仍然我行我素，对张仲景学说奉若圭臬。其实据学生们说，曹师并非泥古不化，一概抹煞时方，也常用六味地黄丸、补中益气丸、逍遥丸以及牛蒡、前胡等仲景书中未见的药物。秦伯未曾指出曹颖甫之所以极端地主张研究经方，是认为经方是一切方剂的基本，研究中医应该从源寻流，而不应当舍本逐末，所以他总是强调学习仲景，提倡经方。章次公也说：“曹师善用麻黄、桂枝，深恶痛绝的是桑叶、菊花，所以经方和时方的争执在曹师心目中就只有麻桂和桑菊的区分。曹师也认识辛温解表不适用于某些症状，所以他看到黄坤载用紫背浮萍，就把浮萍当做温病发汗的主药。”（《曹氏伤寒金匱发微合刊·秦序》）